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上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教·研·参·考

求实出版社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上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求实出版社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上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 印张 286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231·77 定价 1.1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教研参考》的说明

为了促进党校的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计划选择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译作、论文、资料，作为教研参考用书，陆续出版，供各级党校参考。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在选编工作中，难免会有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求 实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八月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费尔南多·克劳丁原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学生时代即参加西班牙革命运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64年因与西共领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被指责为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先被排除出中央执委会，后于1965年被开除出党。开除后，西共前总书记卡里略曾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克劳丁要重新入党他将第一个投票赞成。他的著作有《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1848年革命》等。

本书是克劳丁最主要的著作。这部著作运用大量的史料和文献，夹叙夹议地评述了从1919年建立共产国际到1956年共产党情报局宣告解散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建党学说进行了评论。本书立论的基调是：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陷入全面的无可挽回的危机之中。作者抱定的宗旨是要对引起危机的主要因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在作者看来：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模式有漏洞”，事态的发展否定了他关于世界革命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势的假设（下册308页），在他晚年的著作里对此已提出了疑虑。（上册46页）可是，“列宁一逝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很快蜕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教条主义，成了一种异己思想，代表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下册309页）

斯大林建立的社会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由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加以利用的基础

上”。“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主观上认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已成为完全不受劳动群众监督和控制的利用生产资料的真正受益者”。这个政权不在劳动人民手里，“而是在一个拥有无上权力、无处不在的警察机构为之效劳的独裁者手里，他的主要统治方法是在政治上进行罪恶的勾当和对群众施行思想控制。”（下册305—306页）

苏维埃政权“把它的教条和模式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屈从于它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在世界革命者心目中，认为“它是第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下册306页），因而每个共产党都必须把它奉为“战略和策略、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下册307页），以致使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沦为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这样，苏联共产党的危机就变成了反映每个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面镜子。”（下册307页）

由于作者以上述立论作为基点，使本书中的取材与分析，在许多地方都不免失之于偏颇乃至谬误，这是人们在阅读本书时很容易发现的。但是，本书材料比较丰富，结构形式不落俗套，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反复申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各国的革命运动，不可能由一个为一国所控制并为一国的利益服务的极端集中制的国际中心来领导。本书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革命，指出两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保卫住了胜利的果实，正是两党领导人违抗斯大林意旨的结果。尽管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的某些观点，或者尚待研究，或者有明显的偏见，但总的说来，作者是高度地评价中、南两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与影响的。

作者在本书引言中声称：“我认为，遭到历史性破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种教条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它的许多主要概念和论点，仍然是有生

命力的，而且是切合当前需要的。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理解他的学说，而且要根据我们本身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情况来把他的工作继续下去。”又说：“我的分析具有‘否定’的一面。但是，如果这种‘否定’能稍稍有助于为革命运动的新形式开辟道路，使运动能尽力摆脱过去的神话和错误，那么，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辩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和有益的。

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国际上的注意，已有西、法、英、德四种文字的版本。这个中译本按1975年纽约与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英译本译出，有疑难之处参照西班牙伊比利亚鲁埃罗出版社1970年的西班牙文原版进行斟酌，作了校核。其中第一、二、三章和第四章第二节按原版译出初稿，再按英译本进行校核。关于经典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根据人民出版社统一版本，《列宁选集》根据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本，《毛泽东选集》根据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本。其他引文因不可能找到全部中译本，绝大部分按原书译出，但有的引文参考了已有的中译本。

本书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外文组组织力量翻译。参加翻译的有吴名祺、吕文镜、唐秀兰、张苹、余瑞先（中央党校外文组），齐春子（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陈执中（中国银行），周叶谦、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建生（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九八二年六月

序 言

艾萨克·多伊彻1950年在他的《异端分子和叛徒》一书的一篇文章中说：“被开除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似乎只能采取 *au dessus de la mêlée*（超脱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乍一听，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建议。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吧。

多伊彻在1950年的文章中，分析了阿瑟·凯斯特勒、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安德烈·纪德、路易·费舍、理查德·赖特和斯蒂芬·斯彭德等曾是党员或党的同路人的作家所写的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评论。他很快就作出结论说，他们能保持沉默就好了。多伊彻显然并不喜欢被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至少并不喜欢1929年左倾反对派失败后被开除的人。他似乎想说，这批人认为当上叛徒太容易了，因为客观条件、开除出党的讨厌步骤、早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带有优越感的挖苦讽刺等一切情况都驱使他们去当叛徒。

其实，被开除者总是开除得不是时候，不是太晚，就是太早。他们思想上对“历史的理性”最喜欢怎样行动，而且会怎样捉弄人的问题模糊不清，长期以来闭眼不看斯大林主义的客观事实，不看苏联以及俄国扩张其势力范围之后形成的社会的真相，就此而言，他们是开除得太晚了。他们在党内进行的那场自己处于少数而且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中，可能有人会了解他们，还会跟他们走，就此而言，他们又开除得太早了。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事物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而大多数党员又落后于希望采取“新方针”的少数先进分子，这种双重的“落后”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偶然局势造成的，而具有历史规律的严密性和严密特点，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各个阶段和历次危机。

因此，多伊彻是不信任党与他们分手、或者他们与党决裂的知

识分子的。他建议他们不再过问政治，超脱于斗争之外，一句话，不参与斗争。多伊彻无疑赞同罗杰·维尔兰特的态度，他由使人异化的信仰主义突然转向大老爷的不可知论。

多伊彻喜欢作历史类比，而作这种类比在革命者之间在理论上是造成过重大破坏的。他建议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仿效过去杰斐逊、歌德或雪莱等人的态度。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呢？因为据他看来，斯大林时代在历史上可以同拿破仑时代相比。因而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应当仿效杰斐逊、歌德和雪莱的榜样。这三人都理解，“不管拿破仑怎样使用了暴力和欺诈手段，法国革命信息的回音仍有力地响彻整个十九世纪”，因而他们并没有加入为神圣同盟效劳的自由派的大合唱。

我们看到，这种历史比拟是牵强附会的。难道十月革命的信息真是“不管斯大林怎样使用暴力与欺诈手段”仍在继续传播？难道经过了斯大林的“热月”政变之后，列宁主义的“雅各宾”精神还能让人体会得到？难道党真是“历史的理性”的化身，因而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成为叛徒？多伊彻虽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些结论，但似乎在作这样的暗示，因为他撰写上述文章时，思想上既很绝望，又还抱有幻想，这种复杂的心情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

不过，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费尔南多·克劳丁不是一名在人民阵线保卫文化与和平的纲领的基础上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作家，后来也不是因为犯有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罪过才被开除出党的。

费尔南多·克劳丁原来是建筑系的学生，马德里年轻共产党员的领导人。他在1933年，或在此前后，放弃了个人的一切抱负，成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并没有按照职业革命家的指令进行，这是另一回事）。从这时起到1965年2月被开除出西共为止，他始终与共产主义运动，与既有胜利又有挫折和错误的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年代，内战、失败与流亡，反对

佛朗哥的地下活动，这都是克劳丁担任西共中央机构领导职务时所经历的事件。

1963年底，西共执委会开展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一直延续到1964年春，并以开除克劳丁等西共领导人而告终。（一次讨论？难道双方反复独白这种毫无结果的对峙，这种不交流思想的谈话也能叫做“讨论”？三十年来按斯大林的办法去做的那种“民主集中制”，注定了少数只能要么机械地服从多数，要么走宗派分裂的道路。这种抉择虽然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但同样是毫无结果的。）

这次冲突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从1956年以来酝酿了多年的问题。一场危机迟早要在西共的领导机构中爆发。但是这个过程（就历史过程和法律诉讼两种意义上而言）的开始和结束的日子不是毫无意义的。1956年不仅是苏共召开二十大的年份，不仅是由赫鲁晓夫出面来作秘密报告的年份，而且首先也是处于俄国霸权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各种离心倾向突然爆发的一年。其中的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倾向基本上是消极的，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体现了对多年来强使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完全服从俄国raison d'état**（国家利益）的做法付出的代价，而这也是克劳丁在分析时阐明的历史问题之一。其他的离心倾向则是属于社会性质的，而且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多年来，从波兰、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这些倾向接二连三地被俄国的军事干涉镇压下去了，但它们把需要社会主义民主这类新工具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需要进行革命，需要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些倾向在政治上的表现确实往往是含糊不清的，因为代表这些倾向的社会力量经受了暗无天日的几十年岁月的煎熬，群众的首创精神被官僚主义彻底扼杀了，他们大

* 英语process一词兼有“过程”和“诉讼”的意思。——译者。

** 法语，直译为“国家理由”，即“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本书对此均译为“国家利益”。——译者。

都不问政治、情绪低落，因而人们除了采取追求名利、成为愤世嫉俗的专家治国论者与笃信宗教之类谋求“拯救”个人的出路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

另一方面，在西班牙，1956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这是工人和学生奋起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的一年。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内战期间的幻想和宿命论的影响。这也是闭关自守时期沿袭下来的政治领导制度开始发生危机的一年。西班牙的资本主义经济，迫于客观需要，开始改变它的目的，从粗放式的积累阶段进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阶段。换句话说，西班牙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已经不可能是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而不能不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了。这是西班牙行将步入“现代”阶段的明显标志。

但是，1963—64年西共领导层的危机终于成熟而达到爆发点时，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西班牙的斗争战略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相反，对现实的主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看法同现实本身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大。在党的各级机构、在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这都是一个倒退的时期。

在苏联，“非斯大林化”没有超越中央官僚机构的领导集团之间进行清算并重新分配角色的范围，制度的基本方面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在西班牙，1962年工人斗争的巨大规模本身就表明“全国和平罢工”的战略显然已遭到失败。这些斗争说明，有必要以崭新的方式来对待西班牙革命的一些问题，如革命的性质、革命的近期与长期目标和革命中的阶级联盟等。

费尔南多·克劳丁1965年被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听从多伊彻的忠告，没有“超脱于斗争之外”，也没有“不参与斗争”。他不想去仿效古人杰斐逊、歌德和雪莱，而是向当代的多伊彻本人学习了。尽管他们两人在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迥然不同，得出的政治结论也各异，克劳丁却跟多伊彻一样，抱定宗旨，要对共产主义运

动失败和蜕化的原因求得全面的了解。这样一来，他当然也就把自己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要受讯问了。但是，把握和理解自己经历过也曾参与创造的历史经验，这难道不是理解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的意义的最好方法吗？

克劳丁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振奋人心的特点。他在历史地分析共产国际时，无意拿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证实他自己的疑虑、怨恨和理论方面的直觉力。他进行研究，把运动的现实及其辩证的发展过程客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对历史现实的这种安排使克劳丁的著作在结构形式上不落俗套而具有独创性。他突破了狭小的时间顺序的框框，建立起一种辩证的顺序，其中必不可少的逻辑结构与纵横的历史本身，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一读这部著作，接触到的难道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独有的特点吗？

豪尔赫·森普伦

引言

1956年对我说来，正如对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一样，标志着与对我们运动的现状和远景所持的自慰和乐观观点决裂的开端。在这以前，对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将来，在认识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人类的超天才，为我们解决了一切基本问题。革命的道路无疑比我们年轻时所设想的更长、更艰难，而且还要通过落后国家，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曲折，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但是这条道路对我们说来仍然是明确和可靠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最终建成，在许多国家也将胜利建成，而资本主义正经受临终前的痛苦，在“总危机”的“第二阶段”上挣扎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殖民地后方”的崩溃。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具有特种性格”的共产党人构成唯一有觉悟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我们掌握了曾千百次为实践所证实了的科学理论，受到摧垮希特勒军队的这种巨大力量的支持，毫无疑问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遭受的失败是“客观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造成的，而我们的政策一直都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共产国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仍然能指望得到列宁、斯大林的党这样一个英明而富有经验的向导的援助，这种援助能弥补跟随列宁、斯大林的党前进的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不足。总之，世界范围的最终胜利是有保证的。这只是时间问题、坚持努力的问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披露，随之而来的匈牙利和波兰工人与知识分子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叛乱，一下子就把对这些问题的全部观点都摧垮了。在这个废墟上产生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特别有一个问题，它包括了其余所有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帮助我们去解释现实，而是掩饰了

现实，使我们看不清现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我自己来说，通过对二十五年来受斯大林主义教育阶段进行长期而痛苦的清算，通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1947年以来我就是其中的成员）内部一系列冲突，我才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我于1965年，与最年轻的领导成员费德里科·桑切斯*同时被开除出党。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与我的相似。正如俗话所说，天下无绝对的坏事。这次不可避免的事件倒使我获得了时间和思考的自由，可以竭尽我的知识和经验之所能，去寻求我上面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了。这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开始并不清楚的问题得出了结论：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主义的党，在国内和国际方面，在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的职能方面以及执掌政权的过程中——在五十年代已陷入全面的和无可挽回的危机之中。由于它的本性，它不可能使自己转化，即黑格尔所说的“否定”自己。当然，这并不排除这个运动的某些比较有实力的党有可能对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作出贡献，而我们的时代无疑是需要这样的先锋队的。必须把许多共产党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与其束缚这种能动性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组织体制区分开来。

我谈到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队（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消除了这方面有个时期曾使我伤脑筋的疑虑），因为我认为，遭到历史性破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种教条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它的许多主要概念和论点，仍然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切合当前需要的。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理解他的学说，而且要根据我们本身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情况来把他的工作继续下去。这迫使我们承认许多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歪

* 即为本书作序的豪尔赫·森普伦。费德里科·桑切斯是森普伦在西班牙国内作地下工作时用的化名。——译者。

曲的前提，就在于它成了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个事实本身。斯大林主义不是这种歪曲的第一种形式，恐怕也不是最后一种，这不是偶然的。我对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研究不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分析的一种尝试而已。

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如此之大，又如此复杂，以致只有通过各部门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著作才有可能弄清。在这方面迄今已有许多著作问世，但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出版本书并无奢望，不过想在这方面也做点工作而已。本书不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而是对引起运动危机的主要因素及其过程的一些分析。这无疑会使我的分析具有“否定”的一面。但是，如果这种“否定”能稍稍有助于为革命运动的新形式开辟道路，使运动能尽力摆脱过去的神话和错误，那么，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辩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是否还需要说，这本书不仅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而且也是作者的自我批判呢？不管怎么说，后面这一点是无足轻重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

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害怕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

——列宁

目次

(105)	译者前言	(1)
(106)	豪尔赫·森普伦的序言	(I)
(107)	作者引言	(VI)
(108)	第一章 解散	(1)
(109)	长期危机的最后一幕	(1)
(110)	历史的讽刺	(6)
(111)	承认破产	(16)
(112)	第二章 理论危机	(32)
(113)	列宁的理论的梗概	(32)
(114)	垂死的资本主义?	(41)
(115)	列宁最后的疑虑	(46)
(116)	作为修正主义者的斯大林:	
(117)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53)
(118)	理论瘫痪的原因	(71)
(119)	第三章 铁板一块	(95)
(120)	苏联模式的移植	(95)

第一编 共产国际的危机

第一章 解散	(1)
长期危机的最后一幕	(1)
历史的讽刺	(6)
承认破产	(16)
第二章 理论危机	(32)
列宁的理论的梗概	(32)
垂死的资本主义?	(41)
列宁最后的疑虑	(46)
作为修正主义者的斯大林: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53)
理论瘫痪的原因	(71)
第三章 铁板一块	(95)
苏联模式的移植	(95)